

盐

品味食物中沉淀的文化
触摸历史中隐含的细节

(美) 马克·科尔兰斯基(Mark Kurlansky) 著 夏业良 丁伶青 译



Salt

A World History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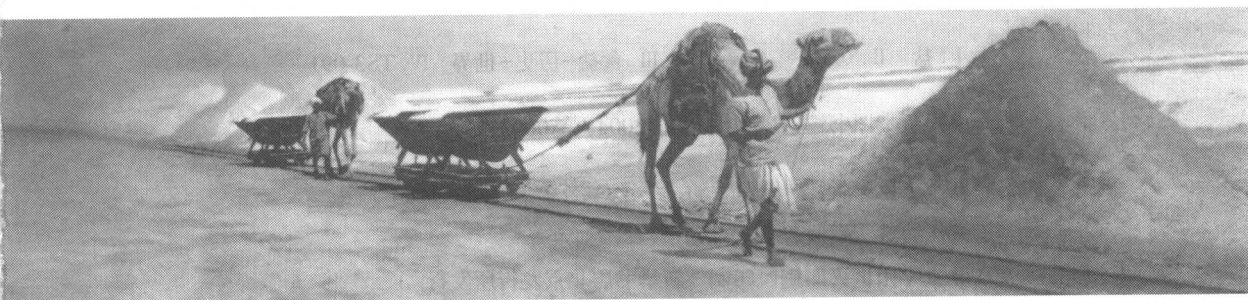
品味·食尚

盐

Salt

A World History

(美) 马克·科尔兰斯基(Mark Kurlansky) 著 夏业良 丁伶青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Mark Kurlansky. Salt: A World History.

Copyright © 2002 by Mark Kurlan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alker & Compan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4 by China Machine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Walker & Company通过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3-60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盐 / (美) 科尔兰斯基 (Kurlansky, M.) 著; 夏业良等译.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1

(品味·食尚)

书名原文: Salt: A World History

ISBN 7-111-14750-2

I. 盐 II. ① 科… ② 夏… III. 食盐-历史-世界 IV. TS3-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0355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颜诚若 版式设计: 刘永青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18mm × 1020mm 1/16 · 19.25印张

定价: 29.8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代 序

历史杂谈

哲学家爱德华·霍莱特·卡尔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题目叫做《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应该讲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提法，即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为何。对此问题一种较为普遍的回答是：历史无非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无数人类活动的经验，而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能就是要用事实说话。持这种看法的人（如英国近代史专家格拉斯比在其2001年的《亲缘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在于解释事件如何发生而不是为什么发生，在于不借助任何理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重要的是事实，而非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因为任何一种价值体系都难以避免私欲和欺骗。从相当意义上讲，公元前5世纪孔子在《论语》中就阐述过类似的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此，朱熹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排除价值或主观判断，用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人类能做到吗？

在此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对历史或对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即使能够客观地记录事实，但记录的完备性究竟怎样？由于事实的领域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以至于那些最客观公正的人也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或好恶标准对事实进行筛选。卡尔对历史本意的关注，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这类问题的复杂性，因为筛选事实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在历史中注入价值判断或利益影响的过程。对此问题，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讲到，如果存在着人类历史的话，那也必须是全人类的历史，是全人类希望、斗争和受难的历史。然而这种历史根本就写不出来，因为“历史资料”大多是些能够引起“强势”记录者足够“兴趣”并经过选择而加以

记录的事实。结果，人类看到的通常只是一部部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史。正是基于历史事实记录的不完备性，由于关注“特殊历史事件”而难以推导出“普遍的历史规律”，波普开始怀疑历史的意义。

即使存在着客观真实的事实，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麻烦。人类生活或经验如此丰富多彩，为那些标榜客观中立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许多问题上，一旦你想要证明什么，那就一定能够证明什么。这也恰是波普在《猜测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拒斥（历史）归纳主义，推崇证伪方法的主要论据之一。查尔默斯在《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中曾经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学表达式：当A为无论多大的数值而B趋于无穷大时， $\lim(A/B)=0$ （取极限的结果为0）。换句话说，即使人们可以找到数量巨大的经验事实，但只要样本数量一定，相对于无限的人类生活而言，人们仍旧无法推导出牢靠的一般性结论来。据称，这个看上去格外简单的数学结论清除了归纳主义的最后避难所。

接下来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什么是事实？究竟存在不存在“客观真实”的事实？许多人都知道那只奇特的“欧拉酒杯”。伟大的德国数学家欧拉曾巧妙地构造了一只“酒杯”图画，它看上去既像是两张面对面的脸，又像是一只高脚杯。此杯因此而得名。由于设计巧妙，欧拉酒杯引发了这样一种“窘境”：面对同一事物，不同人眼中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面对特定历史“事实”时，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各异。究竟谁眼中的那个事实才算“真正”的事实？判定的标准何在？这类现象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人类的观察活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观察结果。他在《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中引用的话，即“自然比人类更早，而人类比自然科学更早”，实际上是在表明，由于人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或掌握的理论结构、所使用的工具甚至价值观，故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或影响的。换言之，的确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却不存在真实的事实。

对事实或证据真实性的质疑，首先来自对事实记录者“诚实品格”的不信任。鉴于对“事实”的收集与整理往往是根据一些先行理论或意识形态来完成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谓“纯粹的”事实。因研究美国货币史成果卓著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教授在获奖演说中谈到，凭借直觉，他原以为自然科学家的见解要比社会科学家的观点来得更客观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判断在他听到一位生物学家的评论后彻底改变了：只要了解了一位生物学家的政治观点和所倾向的理论，你也就等于知道了他的科学见解。对事实表示怀疑的第二个理由，源于对部分记录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要知道，许多历史学家是在皇帝、将军以及独裁者的威胁或监督下进行写

作的，因而他们记录下来的往往是被扭曲了的事实。更有甚者，各个时代都有卖身求荣的“历史学家”。用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阿克顿勋爵的话说：“在那些持剑强人身后，总是跟着持笔的衰人。先是罪犯杀人，后是这些诡辩家替杀人犯辩护。这样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杀人犯同样地恶。”（见《法国大革命讲稿》正文与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不存在“真实”的事实，等于说历史事实可以改变。可能吗？据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柯林武德的说法，答案是肯定的。在《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他写道，历史学是一种探讨，其对象是人类的“活动事迹”，为的是把事情弄明白（在此意义上它是科学）；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来进行的，其价值在于自我认识，亦即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在这里关键要素有二，即证据和想象。所谓证据，是指那些被叫做文献的东西，是一种已经存在，经由历史学家思索便可得到某些答案的东西。某种证据之所以会变化，是由于历史学家们的能力、历史研究方法以及解释证据的原则在不断地变化着。世人关于利益的内容、获取途径和竞争程度的改变，势必在“证据”上得到反映。每代人都会或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历史，其理由也在于此。说到这里，克罗奇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一书中断然地得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论断，也就得到了某种呼应。证据可以改变，想象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思维画卷，往往是一张由想象织成的网。这张网是在由一系列所谓“权威陈述”提供的某些“固定网结点”之间展开的。那些网结并非现成地赐予我们，而是需要历史学家用批判思维和想像力来编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假定存在着客观事实，但事实终归是要有“意义”的。在麦基编辑的《思想家》一书（三联书店1987年版）中，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R·M·爱尔说道，道德理论的基本问题一直是：你能从事实中获得价值吗？你能从一个“是”字中获得一个“应当”吗？人们可以运用充分的证据证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相对弱智，但在回答究竟该给弱智者以较多还是较少的教育这一问题时，事实的客观性却提供不了多大的帮助。以弱智为由而不把稀缺的财力物力用于弱智者言之有理，同样，以弱智为由要求增加对弱智者的教育投入亦有道理。这里，指出部分人是弱智者这一事实并不能必然推导出应该如何教育他们。在相当多的场景中，我们更需要的还是伴随“应该”而来的行动或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在历史学家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分工很有必要，但仅仅把目标限定在发现并陈述事实的范围内，历史学家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似乎轻松了些。历史学应该有更崇高的目标。

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历史学的目的与功能。在阿克顿勋爵看来，历史学决不是记

忆的负担，而是照亮心灵的光芒，是人类的良心，是解毒剂，是一出令人激动的戏剧。剥削者和谋杀犯都有可能善终，但他们不可能永远逃脱惩罚，因为历史学会说出他们的真面目，从而让他们身败名裂。真相高于宣传和偏见。为了做到客观公正，他一再告诫其学生，要努力对朋友和敌人一碗水端平。他还说，政治人物经常不得不吝啬真话，或不得不用误导性的语言进行宣传，甚至撒谎，并以国家利益为自己开脱。历史学家的使命在于通过说出事实真相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阿克顿心存这样一种信念：尽管人类确实很糟糕，但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某种道德本性，它能使我们慢慢地减少罪恶。“对观念要比对行动更严厉”，是阿克顿作为历史学家的又一特点。他坦言，他对纳粹理论之痛恨更甚于对其实际后果之厌恶。作为研究者，批驳这些理论正是他的使命。

历史的本质和功能，实际上也就是“述”与“作”。“述作”在中文里自古就是一个词。《礼记·乐记》有言：“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孔子的“述而不作”，来自于他的“删《诗》、《书》”。在“删”的过程中，他的价值取向或判断准则实际上已经融入其中了。《春秋》一书，借用司马迁的话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从司马老先生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领略到两点含义。其一，孔老夫子在尊重“事实”的同时又暗含良苦用心，暗含使“乱臣贼子惧”之意，正所谓“春秋以道义”也。其二，作为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弟子，有了孔子这面旗帜并以孔子为楷模，司马迁成就了自己的历史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熊彼特对历史情有独钟。在《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中，他把“经济分析”划分为三大块：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位因著有《经济发展理论》而名闻天下（其中他铸造了“创新”概念）的经济学家开诚布公地写道，假如让他“三舍一”的话，那么首先放弃的竟是理论。如果再被迫选择，最后保留下来的就是历史。对此熊彼特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其次，对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新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贡献由此得以显现）。正是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最后，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历史经验的缺乏。至于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其实，今天人类所犯的许许多多的错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研究历史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吗？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史教授戴维·兰德斯看来不但有，而且不止一个。1993年在“托尼讲座”（以《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而闻名的里查德·托尼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英国经济史专家）中，他直言不讳地给出了一个“历史分析的金科玉律”：宏大的过程需要有宏大的原因。他进一步解释说，恢宏的系统性变化的复杂性要求有复杂的解释，其中包括导致相对重要性变化的多重原因，“化合依赖性”指的是当某些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时，其作用就会发生变化，而“现时依赖性”指的是当某种变化出现时，某些因素才会起作用。兰德斯把变化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创新、回应和调整的过程，并不乏勇气地历数了历史学家们的“原罪”：坚持绝对的确定性；相信反事实假定；把数学的建构或虚构物当成事实；把复杂过程变成多种因素之联合概率近乎为零的偶然事件；无视问题或不进行深入探究。他还特别警告说：“经济史需要保护自身不受坏数字的侵害。我们的计量经济学的技艺越是精湛，对定量分析越是依赖，我们就越是需要这种保护。”作为熊彼特的高足，兰德斯的的确出语不凡。这篇演讲后来以“历史中偶然性的作用空间：用小事件解释大变化”为题目发表在美国《经济史评论》（1994年第4期）上。他提出的“化合依赖性”和“现时依赖性”这两个概念，值得我们仔细琢磨，认真把玩。

历史分析自然少不了对历史进行分类。在《论历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把历史一分为三。其一为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这主要是指人类与其周围的地理、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历史。这种历史进展缓慢，变化细微，自我重复，周而复始，似乎和时间没有任何关联，讲述的是人类与无生气的自然界接触的故事。其二为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它涉及经济、国家、社会、文明以及这些力量如何进入战争的角斗场。此类历史类似于影响地中海海面生物的深层暗流。其三为传统历史，亦即更注重个人作用的事件史。这种历史关心海面的波涛和浪潮，是一种短期、迅猛、神经质的振动，其感情色彩最为浓重，内容丰富，人们也最感兴趣。相应地，按时间长短，布罗代尔又把历史划分成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

在上述三类历史中，最重要或最受历史学家们青睐的，当属那记录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也就是社会史。而社会史研究的主线，我以为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看重的阶级分析。在“卡尔·马克思”一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恩格斯写道，马克思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顺便指出一点，阶级分析并非为马克思所独有。法国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中就曾明白无误地写道：“无疑，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

来反驳我；可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另外，尽管阶级立场对立，但阿克顿勋爵秉承的同样也是阶级分析。他写道，时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国家栋梁了，他们要求获得与自己的人数相称的权力，要自己治理自己；他们提出，国家应当进行改革，统治者应当是他们的代理人，而不是他们的主子。于是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我在前面提及历史分类，除了表达对布罗代尔的敬重之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这种分类有助于我们对《盐》一书的欣赏和把握。从其自然属性和它与人类之间较为稳定的关系（比如烹饪时的调味品和腌制鱼类）上看，盐的历史应当属于那“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从开采、晾晒、运输、贸易、税收、走私犯罪、财富积累、由其引发的集团或国家之间的竞争乃至战争来看，盐的历史显然应当归入社会史。从其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上看，比如加勒比奴隶制的起因不仅和蔗糖有关，还和海滩晒盐有关，再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的军队险些因为产盐地被占而功亏一篑，盐的历史大致也可以算作传统历史。或许，正是因为盐和人类味觉之间有着持久、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特征，盐才享有了“一身兼三史”的殊荣。也许正因如此，以盐为叙述、理解历史的切入点，才有了些与众不同的“味道”。

应该讲，这是一本内容丰富、文笔优美、引人入胜的历史书。此书一看就知道不是出于经院职业历史学家之手，也就是说它不是按照“刻板”的逻辑展开讨论的。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它引人入胜的一个原因。本书作者科尔兰斯基阅读广泛，并且是个有心人，把凡是和盐有着几分联系的故事几乎都一网打尽。阅读此书，我发现，古埃及法老和普通埃及人在死后被制成木乃伊时所用的盐是有区别的；我国四川省自贡市的先民们在两千年前就开始用天然气焙煮盐水来制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盟军的一个分队在德国境内一个深达1200英尺的盐矿中发现了纳粹政府藏匿于此的100吨金条和一千多幅包括伦勃朗作品在内的绘画；当今世界最大的产盐国和用盐国都是美国，并且其每年所产4000万吨盐中有一半以上用于冬季路面除冰。这样的著作读来轻松，特别满足了像我这样充满好奇心的读者的需求。能把平淡无奇的盐的故事写得如此不同凡响，也确实不容易。

从读者的角度看，遗憾总还是有的。对有些在我看来是重大的问题，科尔兰斯基着墨不多或未与深究。虽然他在多处谈到，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就把盐的生产与经营当做税收的主要来源，而诸如埃及、印度等国家的税收依赖于盐税的程度却并不深，但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读起来却不够解渴。另外，作者对于盐在腌制肉类，特别是鱼类过程中的作用、手法和口感等精妙细微的描写除了让我这样的读者产生无知之感外，有时也让人觉得过于琐碎。当然，对阅读内容的选择权，最终还是掌握在读者手中。

本书作者马克·科尔兰斯基是美国著名历史题材作家。除了《盐》以外，1997年和1999年他分别出版了《鳕鱼》和《巴斯克世界史》。他最新的著作是2004年初面市的《1968：撼动世界的一年》。评论界一致认为，科尔兰斯基叙述历史的风格独特，并经常从看似简单、平凡的题目入手，渐渐地把远远超出读者想象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揭示出来。也许是由于曾经在纽约和新英格兰担任过职业厨师和糕点师，他对美味佳肴和食物史拥有浓厚而持久的兴趣，并且还为《食品与酒类》杂志撰写食物史方面的专栏文章。为了《盐》一书的写作，他曾周游世界，从中国到中东，从非洲到斯堪的纳维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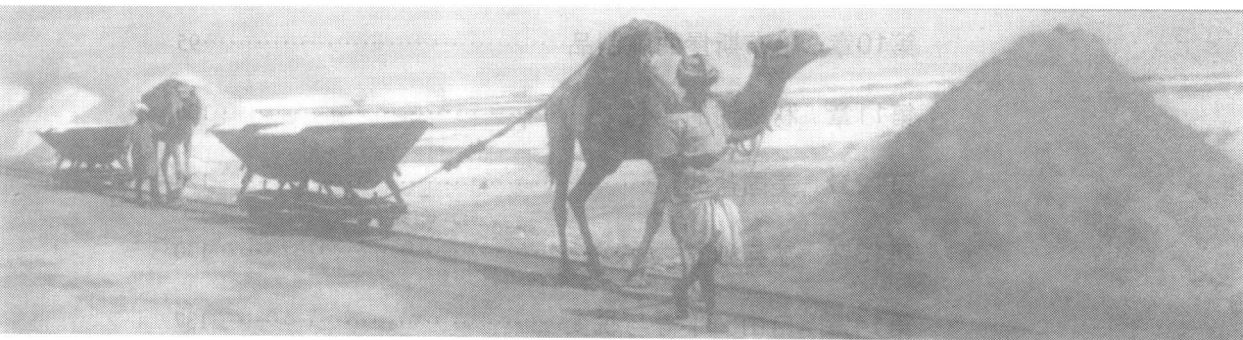
记得兰德斯还讲过，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必须如此的历史，可能那样的历史，应该这般的历史。但用这样的分类来套科尔兰斯基的历史著述，难免给人以削足适履的感觉。我喜欢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里讲，科学家所能做出的贡献与其说是提出新理论，发现新事实，不如说是经常发现那些用于观察旧理论和旧事实的新方式。创立全新的观察方式本身就是对科学的开创性贡献。如果你给出了比较优秀的语言和比喻，你也就确立了新的观察方式。如果用此作为一种大致的标准，也许有可能，或者应该，抑或必须再增加一种历史。我姑且称之为“科尔兰斯基历史”。除了盐和鳕鱼以外，还有数不胜数的事物可以成为史学家的“猎物”。

像我这样一位以研究经济学为业的人，去为一部历史著作写序，在有些读者看来一定有些不伦不类，至少有不务正业之嫌。在此我想表明一点，对历史学和历史本身我素来心怀敬意和兴趣。本文大概有五分之一篇幅来自于我13年前的博士论文的注释。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努力把经济学打造成“社会科学”或“科学”时，我倒更愿意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发的地方，把政治经济学视为人文研究的一部分，或者将其溶于一炉，其中，历史便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载体，尽管它的真实性和完备性尚有“欠缺”。然而世界的美妙之处在于，恰恰因为存在着这些“欠缺”，历史学或历史学家也就有了可以充分发挥想象，有所建树的空间。在文章的开始我说道，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清理一下我对历史理论的思考，想借此理出一个头绪来，对历史学是什么（本体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论）等问题进行一番思索（我这里没有涉及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思路）。就个人的偏好而言，我倒是更欣赏据说是法国哲学家福柯讲过的那两句话：重要的不是历史书写的时代，而是书写历史的时代；重要的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书写历史者的个人态度。

张宇燕

2004年8月12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引言

盐的故事

我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卡塔卢尼亚买了一块岩石，它来自卡尔多纳山坡一侧的采矿小镇。这块岩石是不规则的粉红色梯形物，它的表面被雨水刻蚀出一条又长又曲折的凹槽，具有一种奇特的半透明色，看起来好像是玫瑰色石英与肥皂的混合物。它之所以看起来有点像肥皂，是因为它在水中易于溶解，并且它的边缘就像一块用过的肥皂那样光滑。

我为它花费了太多的钱，差不多是15美元。但它毕竟是一块产自著名的卡尔多纳盐山的纯盐块，虽然上面有着玫瑰色镁的光泽。在占据着邻山之巅的那些古城堡中，众多家族在昔日的若干个世纪里从此类岩石中积聚了大量财富。

我把这块岩石带回家，把它保存在窗台上。有一天，它沾上了点儿雨水，那白色的盐结晶开始从粉红色中呈现出来。我的岩石逐渐开始看起来像盐的样子了，而这会毁坏它的神秘性。所以我就用水冲刷这块结晶，然后花了15分钟仔细把它拍干。到了第二天，它卧在一汪盐水中，太阳照耀着这清澈的水坑。几个小时后，方形的白色晶体出现在这水坑之中，蒸发作用使盐水成了盐结晶体。

有那么一阵子，我拥有的似乎是一块魔石，它能持续不断地产生盐水，而本身似乎又不会变小。有时在干燥的天气里，它看起来完全干透了，但是一到潮湿的日子，一个水坑就会再度出现在它下面。我认定自己能够采用在一个小面包炉上烘烤的办法，使这岩石彻底干透，不到半小时，白色的钟乳石开始从面包炉的格栅上往下滴垂。我把这岩石放在暖气片的钢罩上，可是盐水会腐蚀金属。我又把它转移到一个铜碟上，不久那铜碟底部就出现了绿色的锈迹，当我擦拭掉那变色的污点时，发现这铜碟显得异常光亮。

我的岩石根据其自身的规律而生存。当朋友们驻足而视时，我告诉他们这块岩石是盐，他们往往会小心翼翼地舔一舔岩石的一角，以确认它具有盐的咸味。

有些人认为对盐产生迷恋是一种怪异的走火入魔之举，这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曾拥有过这样的岩石。



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易雍心理学家厄内斯特·琼斯，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朋友，在把心理学引入英国和美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12年，琼斯发表了一篇有关人类对盐迷恋的文章，他发现盐对人具有非理性和下意识的性方面的暗示。为了支持他自己的理论，他引用了阿比西尼亚人在迎宾时向客人馈赠一小块盐，并且让客人轻舔这块盐的古怪习俗。

琼斯指出：“古往今来，盐一直被赋予一种特殊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荷马把盐称为‘神赐之物’，柏拉图把盐描述为对诸神来说极为宝贵的东西。我们如今注意到它在宗教仪式、缔结盟约和行使咒语时的重要性。而在所有时代所有地方，情况应当一直如此，这表明它是人类的普遍性，而不是什么地域性的习俗、环境或者概念。”

琼斯还认为，盐经常与生育能力有关。这一观念也许来自于对那些生活在咸海中的鱼类的观察，这些鱼类的生殖能力要比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强得多。运载盐的船只上，老鼠往往也泛滥成灾，于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相信老鼠只要是在盐中生存，就不需要通过性交来繁衍。

琼斯指出，罗马人把沉溺在爱河之中的人称为在盐国之中（salax），它是salacious（好色的、猥亵的）一词的来源。比利牛斯山人的风俗中，举行婚礼的夫妇把盐放在左边的口袋里去教堂可以防止出现阳痿。在法国的一部分地区，只有新郎带盐，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却只有新娘带盐。在德国，新娘的鞋子里也要撒上盐。

琼斯进一步举出例证说，坚持奉行独身主义的埃及牧师在饮食中戒盐，因为盐会激起性欲；在分属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当达雅克人^①部落中的男子取人首级后返回家乡时，他们均被要求戒除性生活和盐；当比马人^②杀死一位阿帕奇人^③时，此人和他的妻子均要戒除性生活和盐达三周之久。在印度的比哈尔^④，纳金妇女（Nagin women）是被称为“蛇神的妻妾们”的神圣妓女，她们定期戒除盐并且外出乞

① Dayak，婆罗洲上著的一个部族。——译者注

② Pima，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者注

③ Apache，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译者注

④ 印度北部的一个邦。——译者注

讨，收益的一半要交给牧师，另外一半用于为村民们购买盐和甜食等。

琼斯通过回归弗洛伊德理论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弗洛伊德比他早8年就在其著作《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断言，迷信经常会对无关紧要的事物或现象赋予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不自觉地与某些重要的事物有联系。



琼斯的论点是，除非我们真的把盐看得重要，视它为值得着迷的事物，否则这些对盐的关注将很令人费解。琼斯的结论是：“有无数个理由证明原始观念不仅认为盐与精子相关，而且与尿的基本成分也相关。”

琼斯是在一个渴望科学阐释的年代写下这番话的，而且人体几乎每一个部分都含有盐分，盐是细胞功能运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水和盐，细胞就不能获得营养，死于脱水。

但是，也许有关这种迷恋的更佳阐释是在几年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圣克莱尔的一家名为“菱形晶体盐公司”的企业提供了一本小册子《菱形晶体盐的101种用途》，它对此进行了描述，罗列出来的盐的用途包括使煮熟的蔬菜颜色保持鲜亮；使冰淇淋易于冻结；使奶油迅速搅匀；使开水释放出更多热量；有利于除锈；扑灭火焰；清洁竹制家具；粘封缝隙；浆洗一种细薄的棉织品，使之硬挺；去除衣服上的污点；扑灭油脂之火；使蜡烛不滴淌；使采摘下来的花儿保持鲜艳；杀死有毒的常春藤；治疗消化不良、扭伤、喉咙痛和耳朵疼等。

盐的用途远远超过101种，这是尽人皆知的。经常被现代制盐业引用的数字是

14 000种，包括药品制造、融化道路上的冰雪、为农田施加化肥、制造肥皂、软化水质和漂染纺织物等。

盐是一种描述带基酸反应所产生物质的化学术语，当钠（一种可以突然迸发出火苗的不稳定金属）与一种致命毒气氯发生反应时，就变成日常必备品氯化钠，它来自人类食用的惟一的岩石家族。世上有许多种盐，其中有很多是可以食用的，并且它们经常被同时发现。我们最喜欢吃的一种是氯化钠，它具有我们称为咸味的口感。其他盐类则具有不受欢迎的苦味或者酸味，虽然它们对于人类的饮食可能也有价值。婴儿食品的配方中包含三种盐：氯化镁、氯化钾和氯化钠。

氯是消化和排汗所必需的，而人体自身不能产生钠，缺少了它，人体就不能传送营养物质或氧气，无法对神经脉搏或者运动肌肉进行传导，心脏也不能跳动。一个成年男性体内含有250克盐，这些盐足够装满餐馆中的三四个盐瓶，但是随着人体运动，盐分也在不断地减少和消失，因而补充这些盐分就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个法国民间故事，说的是一位公主向她父亲宣称：“我就像爱盐那样爱您。”父亲被她的轻慢所激怒，将女儿逐出王国。后来他被禁止摄盐，方才真正认识到盐的价值，因此得知女儿对他敬爱的深度。盐是如此平常普通，如此易于获得，并且如此廉价，以至于我们已经忘记：从人类文明开始直到大约100年前，盐都是人类历史上搜寻频率最高的一种商品。



盐能够保存物质。直到近现代，用盐保存还一直是保存食物的主要方式。埃及人在制造木乃伊时使用盐。这一避免腐烂和维持生命的能力，已经赋予了盐以一种宽泛的隐喻性，这种隐喻性在弗洛伊德看来，也许是一种附加在盐上的非理性的附属物、一种看起来很琐碎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把盐与长寿和永久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它们都具有无穷无尽的意义。

对于古希伯来人以及现代犹太人来说，盐是上帝与以色列缔结盟约的永恒象征。在《圣经·旧约全书》第四卷的律法《民数记》中，有这样的表述：“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后来在编年史中又有这样的文字：“以色列的上帝之神将以色列天国统治永远给予大卫，根据盐约平均地给予他和他儿子们。”

每个礼拜五的晚上，犹太人都会用安息日面包蘸盐而食。在犹太教中，面包是食物的象征，它是来自上帝的赐予，把面包浸蘸在盐里可以保存它，即保留了上帝与其子民之间的协议。

忠诚与友谊若以盐来封存，其本质将永不改变。甚至当盐溶化成液体时，它都能够蒸发再形成菱形晶体状。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用盐来封存契约，因为它是不可改变

的。印度军队用盐起誓，表示他们对英国军队的忠诚。古代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他们的祭品供奉中，也把盐包括在内。他们以盐和水呼唤诸神，这些被认为是基督教圣水的起源。

在基督教中，盐不仅与长寿和永久联系在一起，而且进一步延伸，与真理和智慧联系在一起。天主教堂不仅分发圣水，而且分发圣盐——智慧之盐（Sal Sapientia）。

面包与盐作为一种祝福及对祝福的保存，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把盐和面包带进新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犹太人传统。英国人也有分发面包的传统，而把盐带进新家也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1789年，当罗伯特·彭斯^①搬到埃利斯兰的新家时，他由那些排成一长列的亲戚护送着，每个人都携带了一碗盐。一年一度，德国汉堡的居民在街道上带着由巧克力覆盖的面包和一个杏仁蛋白酥糖做成的盐瓶（里面盛满了食糖）游行，象征性地重复人们的祝福。在威尔士传统中，一个盛放着面包和盐的盘子被放进棺材里，然后由一位本地的职业食罪人赶来把这盐吃掉。

因为盐能够避免腐烂，所以它也可以避免伤害。在中世纪早期，北欧的农民就学会了把稻谷浸在盐水中，避免一种叫做麦角症的毁灭性的真菌传染，从而获得丰收。这种真菌传染对人和牲畜都有毒害作用。因此下面这些场景就不足为奇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农民们把盐和其他被认为具有魔力的东西置放在耕犁的小洞里，呼唤着土地女神的名字，并唱起这样的圣歌：“辉煌的庄稼啊，饱满的大麦，雪白的小麦，闪光的小米……”

邪恶的精灵厌恶、憎恨盐，在传统的日本戏院里，每次演出之前都要在舞台上撒盐，以保护演员不受邪恶精灵或鬼怪的伤害。在海地，人们认为打破咒符，使举止怪异者恢复正常的惟一方式就是利用盐的魔力。在非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地方，人们相信邪恶精灵或鬼怪会伪装成女人，它们在夜里脱下人皮，变成火球在黑暗中行走。而消灭这些精灵鬼怪的惟一方式就是找到它们的皮，把盐撒在上面，这样它们在早晨就无法返回了。在加勒比黑人的文化中，盐打破咒符的能力不仅局限于邪恶精灵或鬼怪，他们认为，它会驱逐所有的精灵。

犹太人和穆斯林都相信盐能够驱赶邪恶的眼睛。《以西结书》^②提到用盐擦拭新生儿的皮肤可以避免鬼怪的侵扰。在欧洲保护新生儿的做法不是把盐放在新生儿的舌头上，就是把他们放进盐水中浸泡，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比基督教洗礼要早得多。在法国，直到1408年这一做法才被废除，从那时起，不再采用盐水浸泡或尝盐的方式，而改用

① 罗伯特·彭斯（1759—1796），杰出的苏格兰诗人。——译者注

② 《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一卷。——译者注

洗礼的方式。在昔日的欧洲，尤其是荷兰，这种做法改为在婴儿的摇篮里放盐。

盐是一种举足轻重的物质，有时又是危险的，对待它需要谨慎。中世纪的欧洲礼仪极为重视在餐桌上触及食盐的方式：只能以刀尖而绝不能用手。在16世纪最为权威的犹太法典Shulchan Arukh（意为“准备好的餐桌”）中，有关用盐礼仪的阐释说，只能用中间的两个手指触及盐才是惟一安全的方式。如果某人用他的大拇指取盐，他的孩子就会死去，而用他的小指取盐，就会导致贫穷，用食指取盐，则会使他成为杀人犯。



现代科学家们常常争论一个成人每年需要摄入多少盐。估计的摄入量从2/3磅到16磅以上。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则需要更多的盐，因为他们必须补充出汗时失去的盐分。这就是为什么西印度的奴隶们吃的是放盐的食物。但如果人们不是出汗过多，那么那些吃红肉[⊙]的人似乎从红肉中就可以得到所有需要的盐分。

马萨伊人[⊙]直接在牲畜身上取血并饮用这些鲜血，以此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盐分。但是含有丰富钾元素的蔬菜却几乎不能提供氯化钠。如同十七八世纪的北美洲，狩猎部落既不生产盐，也不交换盐，而农耕部落则生产或者交换盐。在每一个大陆，一旦人类开始耕种庄稼，他们就开始寻找盐，以便添加到他们的食物之中。他们如何有了这样的需求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忍饥挨饿的人经历过饥饿之苦，所以他们对于食物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而虽然盐分的缺乏会导致头疼与虚弱，然后是头重脚轻式的晕眩和恶心，长期被剥夺盐分，人还会死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并不会产生对盐的渴求。所以，大多数人选择摄入比他们的实际需要更多的盐分，这种冲动（我们喜欢咸味这一简单的事实）本身也许就是一种自然的护卫方式。

获取盐的其他进展有自养牲畜，而不再捕杀野生动物以获得鲜血。动物也需要盐，野生的食肉类动物像人类一样可以通过吃肉来获得对盐分的需求；野生的食草类动物从草料中获得盐分，人类寻找盐的最初一个方式就是跟随动物的踪迹，因为它们最终会走到可以舐盐的盐渍地、盐水泉或其他有益的地方。但是家庭驯养的动物需要喂食盐分。一匹马需要人类摄入盐量的5倍，而一头牛则需要人类摄入盐量的10倍。

试图驯化动物的实践有可能在冰川时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甚至这些早期的人类已经懂得动物也需要盐分。人们观察到，驯鹿不仅会迁移到盐渍地或者海岸旁以获得盐分，而且还会到人们的营地去寻找人类的尿迹，因为尿液中也含有盐分。人们

⊙ 未煮前颜色是红色的肉类，尤指牛、羊肉。——译者注

⊙ Masai，东部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的游牧狩猎民族。——译者注

因此得知：只要提供盐分，驯鹿就会走近人类并且最终被驯服。不过虽然这些动物成了一种食物来源，但它们从来没有真正被驯服过。

大约在公元前11 000年，冰川时期结束了，巨大的冰板覆盖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今天的纽约和巴黎。后来，这些冰板开始收缩并逐渐消失，大约在这时，亚洲狼（一种凶狠的食肉动物，尽管块头不大，可一旦有了机会它却能吃人）开始受到人类的控制，因为其友好的幼仔能够被喂养和训练。于是，一种危险的敌人就这样被驯化成为一种颇有献身精神的帮手，也就是今天人类的亲密朋友——狗。

随着冰河的融化，广茂的野生谷类出现了。人类以及绵羊和山羊都依靠着这些庄稼充饥。人类起初的反应可能是想杀死这些威胁到人类食物供给的动物，但是生活在田地附近的部落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人类能够控制它们的话，绵羊和山羊都可以成为食物来源，他们驯养的狗甚至能够协助完成这一工作。公元前8900年，绵羊在伊拉克被驯化，不过它们也许在更早以前已经在其他地方被驯化了。

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近东的妇女开始在清理后的田地里播种野生谷物的种子，这通常被认为是农业活动的开端。但是在1970年，夏威夷大学赴缅甸的一个探险队报告说，他们在一个叫做精灵洞穴的地方发现了类似于种植蔬菜（豌豆、荸荠和黄瓜）的残迹。经过碳测定，时间是在公元前9750年。

猪较迟才出现，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因为它们并不是简单地吃点青草，而是要吃食物，所以这种驯养的好处尚待时日加以确认。大约公元前6000年，在土耳其或者巴尔干，人们成功地完成了驯养块头大、速度快、力气大的欧洲野牛这一令人生畏的任务。通过控制它们的食量、阉割雄性以及把动物关进畜栏，这一属种开始受到抑制，人们最终驯服了这种野牛。驯养的牛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消费大量的粮食和盐。而欧洲野牛这种奔跑迅捷而凶猛的动物，到了17世纪中叶，就因大肆捕猎而灭绝了。

人们的食物结构是由大量的粮食和蔬菜构成的，由被屠宰的农家动物肉类作为补充，于是获得盐分成为生活的必需，并且赋予盐极大的象征性和经济价值。盐成为最早进行交易的国际商品之一；盐的生产是最早的产业之一，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第一个由国家垄断的产业。



对盐的搜寻在上千年中一直是工程师们的一项挑战，并且促使他们创造了最为奇异和最为独特的机械。人类构想的许多最伟大的公共工程是因为需要运盐而产生的。盐一直处于化学和地质学这两门学科发展的最前列，遗留至今的主要通衢大都是当时修建的贸易路线，联盟因此建立，帝国得到保护，革命因此爆发……所有这一切都是